

一位“老济宁”讲述的运河往事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电视剧《运河风流》一经播出，引发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5月19日，济宁市地方志特聘专家、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刘翰清，由此向《文化周末》记者讲述了更多的运河往事。

给刘翰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剧中的儒商。刘翰清告诉《文化周末》记者，他的祖父辈就是济宁典型的儒商。“我的祖父刘文忠、父亲刘云亭、伯父刘振乾严遵家训：做生意要货真价实，诚信为本，买卖公平，仁义永在。家族生意兼营零售和批发，尤其是批发这一块，面向济宁市市区及鲁西南和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

刘翰清拿出一本《济宁运河文化》，第三章“运河润养百业兴”中记载，“瑞兴号”是刘振乾独资经营的，有资金五万元（银元），坐落在大运河口河北街桥头，这是经营五金铁货业另一产业。

刘翰清说，瑞兴号当年所在位置，就在如今太白楼正南附近。清代光绪年间，祖父刘文忠创立瑞兴号，专营瓷器。宣统元年五金铁货业开业，此后于民国初年成立“瑞兴号”合股商号，是近代济宁最早从事五金交电经营的商号之一，进货渠道主要是天津等地。

大闸口刘瑞兴瓷器店，是近代济宁最大的瓷器交易货栈，5间营业门面面对大闸口老运河桥。街的中段还有路南门面房，正是濒临运河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经营条件，运河舟楫之利，给买货的、进货的带来了十足的利好。

民国初年，全市瓷器行店发展到37家，刘翰清的伯父刘振乾曾任济宁瓷业协会会长。在那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如同一叶扁舟跌宕起伏于商海之中。旧中国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苛捐杂税横行，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焦土政策，纵火将安阜街、大闸口河北化为灰烬，老百姓无家可归，商号关门歇业。1948年济宁第二次解放，党和政府采取扶持工商业政策，给予贷款，瑞兴号获得新生，经营至公私合营。

刘翰清今年72岁，他回忆起当年老运河，仍一往情深。他说，老运河水流湍急，水面打着漩涡，来往船只络绎不绝。尤其是船只过闸，更是小心翼翼，可谓惊心动魄，往往船覆人亡。他记忆最深的是，船上的小孩后背上系着一个长四五十厘米的葫芦，有的系着两三个，他们在船上

周末聚焦

跑来跑去，玩耍嬉嬉。正是这运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运河儿女。

刘翰清说，他的三祖父刘文俊常年住景德镇订货，每年正月十六从济宁出发去景德镇，到年底腊二十三回家过年，年年如此。在景德镇包窑定制各类瓷器，如餐饮用具、酒具、笔筒镇纸砚水瓶等，还有花瓶帽筒花盆、八仙菩萨佛像等。严格精品包装，包火车车厢往山东发货。当时的瑞兴号，除通过运河以外，还通过铁路运货。瓷器从景德镇先运至兖州，再通过济济线，把货物运到济宁。铁货是从天津进货，日伪时期因交通阻隔，也从淄博等地进货。

刘翰清回忆道，家里的生意经，恪守的恰恰是“儒商精神”，如诚信经营，买卖不成仁义在等。搬运瓷器充分体现了经营诚信理念，要轻拿轻放，决不能让瓷器出现裂痕，否则就是残次商品或废品。在经销中不能损人利己、坑蒙拐骗顾客，不然非关门不可。

电视剧《运河风流》多次提到兰芳斋，刘翰清介绍说，兰芳斋创始于清同治年间，是济宁经营精细糕点的百年老字号。1991年，冯骥才先生和母亲来到济宁，他的外祖母戈子良的家就在济宁邵家街。冯先生的母亲戈长复女士，在这里出生长大。老母亲还到兰芳斋买点心，老人家童年记忆最深的就是兰芳斋。

“我与冯骥才先生交往多年，他的母亲今年3月30号仙逝，享年106岁。冯骥才先生让我在济宁邵家街抓几把土，以备老太太骨灰和泥土同时安葬。”兰芳斋三字，系清末翰林庄陵兰先生题写。庄陵兰是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先生的老师，教授音韵学和经学。

《运河风流》中的“济宁三杰”中，刻画了一位清官的形象。刘翰清表示，这个形象不一定有其准确原型，但在民国时期的济宁，确实有闻名全国的清官。1926年出版的《济宁县志》“职官”一节中，有这样一句记载：“王家相安徽巢县人民国十四年五月代理卒于任”。

1925年4月，军阀张宗昌从徐州入山东，任山东军务督办。他的手下悍将许混率部驻扎济宁。许混仰仗张宗昌宠信，借军需的名义，在济宁及周边横征暴敛，强行发行军票，掠夺民财。

这一年的1月，刚刚就任济宁县知事的熊仕昌，因曾在张宗昌的老家担任过知事，知道这个“五毒大将军”和他手下军队的脾性，所以见势不妙，立即辞职走人，携带家人回了安徽凤

阳老家。北伐结束后，熊仕昌在湖北法院谋得一个差事，后来还一路升迁到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等职。他有一个儿子，就是被誉为“龙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

王家相在1925年5月从单县知事调任济宁，代理知事一职。王家相一到任，就遭遇了大麻烦。1924年，军阀吕秀文占据曹州，自立为曹州镇守使，又被段祺瑞任命为第三混成旅旅长。同时，山东省军务督办郑士琦却派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吴长植接任曹州镇守使。

张宗昌入鲁后，准备讨伐吕秀文。1925年5月，吴长植、褚玉璞、毕庶澄所率各旅聚集济宁、兖州，要攻打曹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这些军阀来说，每一次战争都是聚敛钱财的好机会。他们催逼刚刚到任的县知事王家相筹备粮秣军需，一点不满足就枪口相对。

由于历年征敛，地方工商业几近停顿，县财政早已左支右绌，王家相勉强支撑不到两月，就陷入绝境。“近日兵站索取粮秣，伤办军用，商铺金库券之兑换，在在均需巨款。地方财政已濒于绝境。每日供应零星物品，署内又无款供支，筹备实万分为难。倘一有不济，危险立至”。

1925年7月4日晚，王家相留书数封，详细安排完身后事，从容举枪自戕。

《济宁县志》中只记3生：卒于任。王家相认为，教育专款不能动，“将来无可还，岂非教育由我摧残？”司法款项是诉讼人的存款，也不能动，“致令私人损害，相尤不忍”。

死后，王家相连让妻儿送自己尸骨回家的钱都没有。

王家相自戕之后，时任济宁道尹王鸿遇代



为购置棺木和寿衣，于第二天上午将其收殓埋葬。

济宁知事自戕的消息，迅速为《申报》记者获知。有人把王家相留下的信函交给了《申报》。该报分3期连续刊登王家相自戕的消息和他给亲友留下的信函。

一县知事竟因不能应付军阀索饷自戕身亡，这事一经《申报》登出，公众大哗。上海《蜀评杂志》转载了此则消息，并刊发一则言辞犀利的《济宁王知事自戕感言》。

文中哀叹当时官场之沦丧：“搜刮之术，既日异而月新；残民政策，复层出以不穷。特别捐也，附加税也，粮秣费也，军用券也，巧出名目，藉图中饱。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最重之负担，加之呼吁无门的百姓。瓜期届满，囊囊累累，铜符既卸，衣锦荣归。纵令当地士绅出而控告，亦无非一纸空文，敷衍了事。墨迹未干，又膺荐任。此县交代未清，他邑又往履新。惨哉吾民，将无噍类”。

赞誉王知事“既畏军人索款之严，又怜百姓倒悬之厄，处于军阀掌握之中，行不忍人之政，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较之古之史鱼尸谏，直可后先辉映，千古并传”。怜惜他“饰终之服，惟有夹衣；三寸桐棺，佳城难得；运柩之费，不名一文；寡妇孤儿，何以度日？清廉自守，可想而知；凄惨情形，尤堪酸鼻”。

更直指张宗昌暴政是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而其部下有此逼杀知事之成绩，扰害之程度，故非寻常所可比拟。军队之不法，统治之无纪律，尤非他省所能望其项背者。或曰，省长大员尚可电令来署，以威力驱去而代之，区区一县知事，更何足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海叔是我本家的长辈，1948年秋天出生在微山湖畔的一个小村庄，弟兄四人排行老二。他比我大8岁，我从12岁和他一起住了6年多。

村里老人说，海叔一出生就虚弱，好几天不会吃奶，就起名海吧。老家土话“海”就是扔，起这名好养活。他小时候眼上长疾，没治疗，撒了个疝痢，村人就给起外号。他长大了，出门喜欢带副墨镜。

海叔个头不算高，漫长脸，留平头，爱笑，上过两年小学。60年代初，国家积极动员参军入伍，海叔还不够年龄，就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身高体重抽血化验都没问题，心脏有杂音，不能当兵，入伍的梦想就此破灭。

1965年麦收，干旱早地上地薄，小麦长势不好，一亩也就收百十斤，生产队交完公粮，每人能分几十斤。有天中午社员轧完场，都回家去吃饭了，海叔值班看场，离麦场有二三里路，他突然看见麦场冒烟了，拼命的一边往场上跑，一边大声喊村里人救火。

麦场成了火海，他一次次从场边坑里挑水，拼命的往麦垛上泼，头发烧焦了，衣服烧烂了，手也烧破了，火扑灭了，人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村长过来抱住他的人中好一会儿，他才慢慢醒过来，村里专门奖励他5斤小卖。

六七十年代没有化肥，种地只能靠农家肥。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在猪圈里沤绿肥，两三个月有机肥就沤好了，挖出来用小推车拉到村头再搭上半个月，就可以交到生产队换工分。挖粪坑是个力气活，且又脏又臭，我们家和前院的烈属焦奶奶家都没有劳力，这个活每年几乎都是由海叔帮着干。那时候帮着干活不像现在要给工钱还要管饭，就是白给帮忙。

每到那天，俺娘会蒸上一锅小麦面掺玉米面的馍馍，海叔干完活，就把热馍馍端出来让他吃。他每次只吃两个馍馍，喝上一碗白汤，再让也不吃了。其实他并没吃饱，只是想给我家节省一点。

1969年冬天我考上了初中，跟家姐妹多没地方住，我父亲找到海叔让我跟他一起住，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家在我的屋后，那时村里凡是拆了老屋，都要按规划给个新的宅基地，不论

周末济宁故事

老宅子大小，一律给个10米宽、15米长的院子。海叔家的老屋也快塌了，就拆了在村南头建了新房子。老院子暂时没规划，就空了下来，留下了一间4平方米多点的锅屋没拆，屋很矮，没窗户，房顶熏得黢黑，泥挑的土墙也坑洼不平，下大雨时还经常漏雨。

就是这间锅屋，成了我们爷俩的住处。海叔专门脱了一些土坯，垒了一个放煤油灯的台子，再放上他的一个小木箱子，可以在上面放书写字。他还用土坯垒了一个床帮，里面塞了很多麦秸，上面铺了一个草苫子，再铺上苇席，就是爷俩的地铺，也就是床，屋里也就没大有空啦。

床上没褥子，一床破被子一盖就是一冬天，被子上有逮不完的虱子，春天暖和了拆了被子就当被单子盖。夏天满屋蚊子，冬天滴水成冰，床底下还有老鼠。

这间小屋成了我青春记忆里最深刻的地方，也成了我初中、高中一直到当民办教师居住和晚上学习的地方。海叔常说，要想有出息，就要好好学习。你看看咱庄上那个谁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啦，多厉害……

海叔平时时不大喝酒，有时抽颗烟，烟瘾不大。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他让我早点睡觉，说出去有点事，晚回来一会儿。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回来了，坐在床边抽烟，还骂骂咧咧的。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有人给他说媳妇了，让他买了两盒白莲烟，在大队部门口等了半晚上，小闺女终于来了，穿着花棉袄，围着红头巾，个头挺高。见面后媒人说：“你人也还行，如果感觉可以，过几天请吃顿饭再说吧”，带着小闺女就走了。

海叔人实在但不霸蛮，他想，见面的小闺女怎么连一句话也没说，他下意识地回了回头，看见那个小闺女把胳膊搭在媒人的肩膀往前走。他转过身急忙向前跑了几步，借着朦胧的月光一看，原来是邻村的二狗子装女孩骗他的。他大喊一声，摸起砖头就砸过去，吓得媒人和二狗子撒腿就跑。他说，我没追上他俩，要追上非得劈了他们。

那一夜海叔翻来覆去没大睡好，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相亲，也是我见他发脾气最狠的一次。

早晨上学没有钟表，要听鸡叫的声音，一般鸡叫3遍就聪明了，海叔就喊我起床。再不然，有月亮的时候看月亮，阴天下雨就凭感觉。

快考高中的时候学习紧张，海叔怕我迟到，决定买一个小闹钟，可那时候根本没钱买。他就去河堤上采了好多次蒲公英和益母草，攒多了到公社药材站卖了10多块钱，又步行30多公里路，到济宁小闸口典当行想买个旧的小闹钟，可是店里就只有几个大座钟和一快旧怀表。

大座钟肯定买不起，他就花了9块钱买了个旧怀表，怀表上的链子还剩下小一段，回来栓了

我和海叔的故事

张开柱

个绳挂在床头，夜静的时候还能听到表的滴答滴答声。

一开始怀表走得挺准的，过了两三个星期，每天就要慢半小时，我们每天晚上都要拿着表去村卫生室对时间。

有一天海叔帮邻居家盖屋，去两城山上拉石头，累了一天，回来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我朦朦胧胧睁开眼看了一下表，才5点钟，就又睡着了，再睁开眼，太阳都老高了，表还是5点。

海叔猛地坐起来说，哎呀，昨天晚上累了，忘了对表了。再后来，给表上弦表也不走了。海叔仍然把怀表当成个宝贝，找了条小链子，出门的时候把怀表装在口袋里，把小链子系在扣眼上，耷拉在胸前。有时候还在中山装上面的口袋，挂个没有墨水的钢笔，显得很斯文。

海叔的大哥在枣庄煤矿上，有一次他去干了一阵子装煤炭的活，挣了点钱，回来就买了一辆老国货牌的旧自行车，这也是村里第一辆自行车。他有了车，平时也舍不得骑。

有个星期六的晚上，海叔说要骑车带我去济宁逛逛。第二天起得很早，中午到了济宁的大百货大楼。那楼很高，里面卖的东西也很多，但都要票，再说他也没钱买，逛了一会儿就去他远门的亲戚家了。

亲戚家住在南门里的胡同里，一进大门是两大缸金色，有红的黄的黑的三色的五花色的，有眼睛水泡的，有的像个小绒球，还有的像鹅头似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金色。

亲戚用个罐头瓶给我们装了几条，让带回去，海叔又带我去大槐树西面的一家饭店。那里人很多，都在排队，杂合汤5毛钱一碗，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爷俩每人喝了一碗汤，吃了两个馍馍，只是垫垫肚子。直到今天，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在城里下饭店，喝的最好喝的一碗汤。

回家上泗河堤的时候，车子滑进了，连人带车滚了下去。我一路上抱着的金鱼罐头瓶也摔烂了，金鱼洒落在地上，蹦了几下就死了。

海叔爬起来赶紧问我，没扎破手呗，没摔着呗。我说没有。海叔说这事都怪他，要是进城带个铁盒子就好了。他还说这次进城就是去要几条金鱼，然后放在我们的小屋里，没有了就算了，等着再去要。

海叔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什么事也不急躁，也不怪罪和抱怨别人。

我上高中那年，海叔靠给马坡采购站拉脚挣的钱，买了村里的第一个收音机。除了白天听新闻，晚上听的最多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电影录音剪辑，还有革命样板戏和豫剧《朝阳沟》选段，偶尔也能收到流行歌。

海叔最爱听的就是《沙家浜》选段，高兴了就学唱几句，不过他一唱就跑调，还跑得很远。我也从收音机里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了解了更大的世界，也学会了好多电影插曲和京剧唱段，

至今没忘。

冬闲的时候，海叔就去他大哥那里一趟，每次都带回一些新奇的东西，矿上的防毒面罩，带胶的手套，高腰的大水靴子等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海叔为了我晚上看书学习，专门带回来一盏矿灯，像电灯一样亮，照得小屋明晃晃的。

海叔不认字，但他鼓励我读书，他说“读的书多了肯定会有用的，你看看人家赵老师，懂得东西多多……”。我就是用那个矿灯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和《水浒传》等。

后来矿灯没电了，他又从矿上带来嘎斯灯，尽管比煤油灯亮，但是屋太小，气味太大，呛得慌，后来就没再用。那盏嘎斯灯，前几年还在老房子里。

海叔常年有病，但从没把自己当成病人，跟男劳力一样干活，一到冬天就跟着生产队里出去打河工，挖泥抬土样样都干。农忙的时候，他就帮着没有劳力的人家干农活，冬天农闲就帮着别人到济宁八里庙拉稻草。

拉稻草是个很苦活，我也跟着海叔拉过几次。去的时候空车他就拉着我，回来的时候都是他驾车子让我拉编绳。每次都是夜里两点多钟就从家里起身，因为走公路太远，就从程楼过泗河去济宁。

那时泗河上没有桥，要从河滩里趟水过去。冬天河里结冰很厚，要先推着地排车把冰捣碎，再趟水过去。买好稻草回来更辛苦，一辆地排车俩人要拉500多公斤，到了过河的时候，已经负重走了几里路，累得筋疲力尽。

北风嗖嗖，河水刺骨，腿像被割刀一样疼，上了岸腿麻得不能走路。海叔都是给我使劲揉搓腿，然后我们吃点凉干粮继续走。

其实拉一趟稻草，累整整一天，比在家附近最多能省20多块钱，那时候大家都这样，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海叔常说，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到的福。这话我始终记着。

海叔是个乐观的人，他不懂音乐，但他有一件乐器，是一支箫。不知道是洞箫还是南箫，也不知道是G调还是F调。他不识谱，我也听不懂他吹的什么曲子，反正他遇到高兴的事，就吹上一阵子，那悠扬的声音非常悦耳。他烦的时候，也吹上一会儿，那声音听起来苍凉。尤其阴天下雨，没事的时候，他坐在床边，一吹就是一上午。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海叔没文化，身体也不好，依然在家种地。有几个30多岁的光棍汉在外面挣了钱，回家娶了媳妇，海叔对我说他也很羡慕，可是他没钱，也没房子，年龄也大了，也没人给他找媳妇。

90年代初，我调到济宁工作以后，家里老人相继去世，留下了间旧屋也没人住，我就让海叔住到了我的家里。他除了种地，还学会了修自行车，但不专业，总是修不好，也没挣着钱，还挺累。

或许是为了平息舆论，也或者是同情王知事身后妻儿的窘困境遇，当时的北洋政府答应给予抚恤。可是直到1926年2月，距王知事自戕身亡已经半年有余，中华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府祺瑞才批准了《给已故山东济宁县知事王家相遗族恤金办法》。这个震惊全国的故事，才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运河风流》中有裘旅长这么一个人物，原型或是济宁的潘鸿钧，著名的潘家大楼，就是潘鸿钧的私邸。相传有潘鸿钧一夜将八房姨太太全活埋于大楼后院的故事，即“潘子和杀家”。但刘翰清说，这件事属于演义，真实的历史中并无此事。将8具尸体埋到自己家，并不符合常理。较为符合史实的情况是，潘鸿钧得知姨太太与厨师通奸后，只杀了一人，并且将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

刘翰清说，运河上的故事还有很多，运河的潺潺流水，有着诉说不尽的济宁沧桑。

- ①古运河
- ②太白楼广场南端，瑞兴号原址
- ③太白楼
- ④潘家大楼局部



后来，我在城里发现修鞋这个活很好，就专门回家一趟，让他转行修鞋，还让他拜了个师傅，很快就学会了。我帮他买了砸鞋的工具和缝鞋的机子。那时候一个乡里也没几个人干修鞋的，即使有也穿得脏兮兮的。

他去镇上出摊之前，我专门给他买了一件黄色的军褂，买了修鞋用的围裙，穿的很整洁，还显得非常专业。他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生意很好。

他修鞋非常认真，一针一线都很仔细，砸的鞋掌既耐磨又结实，焊接的塑料凉鞋从来不再原处断裂，价格十分便宜，有钱没钱都来修。凭他的技术和实在劲，方圆十里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当年修鞋的名人。

海叔每次来济宁买材料，都从家里给我带点青菜，有时还专门带点微山湖里的鲜鱼。我每次都在黄淮宾馆的食堂里，打两份他最爱吃的荤菜，买4个卷子，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走的时候还要给他带上两斤玉堂酱园的豆腐干和咸菜。

一晃几年过去了，海叔修鞋挣了点钱，买了长虹牌彩色电视机，买了永久牌的自行车，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还买了一副带金边的墨镜，并且镶了一颗大金牙，一笑就闪闪发光，露出满脸的幸福。

我甚至还张罗着，想给他找个媳妇。每次骑自行车回老家，我们爷俩都要喝上一杯酒，然后他会拿出箫来，吹上一段所谓的曲子。每次我走的时候，他都要送到村口，等我走了很远，他才回去……

1997年的一个下午，天色阴沉，秋风瑟瑟，路上落着零乱的法梧桐叶子。我到办公室不久，电话铃响了，老家教学的绪顺叔叫着我的名字，悲声地说：“你海叔不在了。”我缓缓了神，放下电话，泪不由地从眼角滑下来，请了假往老家赶。

前两个星期他还好好的，我在去微山的路上，还看见他在马坡的路口出摊修鞋，怎么说就没了呢？四叔说，海叔一大早就从他住的家老房子里收拾东西，去马坡集上出摊，天气不好不让他去，他不愿意，说上这个集收来的鞋，这个集一定要给人家修好送去，天冷了别影响人家生计。大约11点多钟，他在摊子上觉得有点难受，就躺在地上，有人喊他修鞋，他不答应，才发现他病了。

一位好心人马上跑到马坡卫生院喊了医生，但他已停止了呼吸。他修过鞋和没修过鞋的乡亲都痛哭流涕，好几个哭着说，他给补了好几次鞋了，那还没给他钱呢，正要卖完菜给他送钱呢……都一年他49岁。

过了一会，四叔和我一起到我家的老屋里收拾海叔的遗物，在床桌子上的有一个记账的本子，上头有几十个人名，有本村的也有邻近村的。大概是3种账：有50多人是欠的修鞋钱，都是3元5元的；还有十几个人是借他钱的钱，大多是20元30元的；再就是他送别人的钱，一共有8个人，每家都是100元。这8户人家有6户家里有病人的，有一个残疾人，还有一个是五保户。账本上一共记了1500多元，这应该是他大半年修鞋的收入。

海叔过世26年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但是我每次回到老家，还会想起他。偶尔路过他的坟地，想起他对我的好，不禁潸然泪下……

